

古代骗术何以趁疾病而行

于赓哲

疾病戕害人体,谎言和骗术戕害人心,普通人凭借一己之力也许对付不了病菌和病毒,但健康乐观的心态、科学的头脑,以及最重要的独立思考的精神,能帮助我们抵御谎言与骗术的袭扰。

自古疾病大概是战争之外最好的社会试金石,在疾病面前不仅有人类的善良,也有恶意与谎言,这种谎言有人需要,有人推动,有人接受,来自各个社会阶层,受害者也分布于各个阶层。不是所有偏离事实的都是谎言,有的只是认识误差,而有意的谎言却经常和这种认识误差一起,渗透进社会思想、组织结构、民风民俗之中,沉淀在历史长河里。谎言总伴随疾病,因为疾病威胁之下,人的分辨能力最低,对生命的渴望使人的戒备心理降低,偏听偏信,“死马当作活马医”的心态导致到处抓救命稻草,给了谣言和骗子可乘之机。

骗术面前,人人平等,连秦始皇也是受害者。奋六世之余烈一统天下的秦始皇,中年以后倍感人生苦短,但那时候还没有明确的成仙思想,而是追求长生不老。很多人有疑问:那么多术士为秦始皇求所谓“不老之药”,这种注定要失败的事情是怎么瞒过以法令严苛著称的秦始皇的呢?《东汉生死观》一书中谈到,术士们有解决之道,那就是为始皇帝设置不可能完成的前提条件,不完成则灵药不灵,比如说秦始皇生活过于奢华,心不静则法术不灵,而秦始皇不可能放弃奢华,也不可能做到心静,术士也就得以暂时免责;或者开列极其苛刻的条件,骗了钱逃之夭夭,比如徐福就编造了蓬莱山海神嫌弃秦始皇礼薄,不给仙药的故事,于是秦始皇“遣振男女(童男女)三千人,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”,而徐福则成功卷款私逃。

《史记》卷 6《秦始皇本纪》:“始皇帝幸梁山宫,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,弗善也。中人或告丞相,丞相后损车骑。始皇怒曰:‘此中人泄吾语。’案问莫服。当是时,诏捕诸时在旁者,皆杀之。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。”此事非常著名,史家多以此为当时微妙的权力关系之例证,但此事背后其实隐约有术士的影子,同卷前一段文字更值得注意:

卢生说始皇曰:“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,类物有害之者。方中,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,恶鬼辟,真人至。人主所居而

人臣知之,则害于神。真人者,入水不濡,入火不热,陵云气,与天地久长。今上治天下,未能恬淡。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,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。”于是始皇曰:“吾慕真人,自谓‘真人’,不称‘朕’。”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官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,帷帐钟鼓美人充之,各案署不移徙。行所幸,有言其处者,罪死。

卢生的行为模式与徐福如出一辙,他为秦始皇开列的长生前提条件就是:一要恬淡;二要“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”,一旦行踪被人知晓,则真人不见,仙药不得。皇帝不见外人,这就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条件,但秦始皇笃信不疑,改称自己为真人,并下令宫室之间筑造复道、甬道,有敢泄露皇帝行踪者斩。故李斯削减车骑的行为等于告诉皇帝,有人向外泄露皇帝行踪,导致药效“破功”,从而引起了始皇帝的愤怒。这才是故事的“点”所在。

秦始皇对这些术士未必没有疑心,但“合理化(rationalization)”的心理需求使得他甘心受其摆布,即制造“合理”的理由来解释并遮掩对自己的伤害。在这个过程中,推诿(projection)机制发挥的作用最为明显,即主动使用一些术士为他设置好的客观原因为失败寻找理由,从而继续保持对行为合理性的信仰。但忍耐是有极限的,在术士卢生、侯生逃走并谩骂秦始皇之事发生后,就有了著名的“坑儒”事件,被坑者多数是尚未来得及逃走的术士。

以秦始皇之地位,尚且如此受愚弄,那普通民众可想而知。数千年来民众在疾病的威胁之下也曾被愚弄与摆布,邪教的盛行就是一个典型。每逢疫病时期,邪教就趁机大肆发展信众,所采取的就是“渲染恐怖”加上“禳灾祛病”的手法。例如东汉后期,从灵帝到献帝长期的疫病流行,大大促进了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发展,而疾病和祛病就是他们发展信众、巩固组织的重要工具,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拟国家化、军事化的组织,这一点对汉代朝廷来说是极大的教训,也就无怪道教人士对他们的批判了,如葛洪《抱朴子内篇》卷 9:“曩者有张角、柳(刘)根、王歆、李申



元代王蒙《葛稚川移居图》(局部),故宫博物院藏。中国古代留下诸多修仙炼丹轶事,此图描绘东晋人葛洪携带家眷移居罗浮山,修道炼丹。

之徒,或称千岁,假托小术,坐在立亡,变形易貌,诳眩黎庶,纠合群愚。”

三国以降曾有对圣水的崇拜,往往发生在瘟疫爆发时期:《北史》卷 27《李先传》:(北魏)灵太后临朝,属有沙门惠怜以咒水饮人,云能愈疾,百姓奔凑,日以千数。

《高僧传》卷 10《晋洛阳大市寺安慧则》:晋永嘉中,天下疫病,则昼夜祈诚,愿天神降药以愈万民。一日出寺门,见两石形如瓮,则疑是异物,取看之,果有神水在内。病者饮服,莫不皆愈。

葛洪《抱朴子内篇》记载过以假充真的“圣水骗局”以及政府的应对。洛西有古墓,早已坍塌,内有积水,由于墓中多石灰,石灰汁主治疮,有人在这里洗疮得愈,于是四方病患云集,不仅洗,还有内服者,不久就出现了利用此墓敛财和搞淫祀的现象:“近墓居人,便于墓所立庙舍而卖此水。而往买者又常祭庙中,酒肉不绝。而来买者转多,此水尽,于是卖水者常夜窃他水以益之。其远道人不能往者,皆因行便或持器遗信买之。于是卖水者大富。”官府最后强行毁坏了古墓,制止了癫狂的民众。

官府可能对骗取钱财的事情睁一眼闭一眼,但对于威胁到统治、蛊惑人心的邪教一贯是要遏止的。唐代圣水崇拜卷土重来,李德裕《会昌一品集》记载亳州忽然出现圣水,据说可治百病,立竿见影。南方百姓骚然,“自淮泗达于闽越,无不奔走”,“每三二十家即顾一人就亳州取水”,渡江人数众多,防不胜防,水每斗卖到三贯,且有歹徒以其他水冒充。李德裕

命令填塞泉眼杜绝根本,并上报皇帝。

历代统治者都警惕这种利用疾病的邪教。《朝野僉载》卷三记载,唐高宗时有妖人刘龙子以祛病为由妖言惑众,作一金龙头藏袖中,以羊肠盛蜜水,接在龙头上,羊肠缠着胳膊藏在袖中。有求医者则伸出龙头,流出水来,号称包治百病。敛财无数,随着信徒的增多,此人竟然逐渐有了政治野心,“遂起逆谋,事发逃走,捕访久之擒获,斩之于市,并其党十余人”。此事在《新唐书》里做如此记载:“开耀元年……五月乙酉,常州人刘龙子谋反,伏诛。”对于官府来说,骗钱事小,但利用邪教有政治图谋是大事,所以刘龙子在正史里不是作为医骗而是作为谋反之人留下了名字。

至于欺骗钱财的医骗更是史不绝书。东晋葛洪《抱朴子内篇》卷 9 讲述了一个故事:兴古太守马氏有亲戚来投奔,穷困潦倒。而马太守给支的招是让他冒充医生,对外诈称是外来的神人道士,治病手到病除,“云能令盲者登视,瞽者即行。于是四方云集,趋之如市”,很快获利,钱帛堆积如山。一个毫无医术的骗子何以能获得如此成功,盖因有一套控制群众心理的办法:“当告人言愈也,如此则必愈;若告人未愈者,则后终不愈也,道法正尔,不可不信。”即告诉患者,出外若有人问治疗是否有效,则回答有效,若回答无效就真的无效了。成千上万的患者在“信则灵”的心态摆布下,真实信息交流完全阻断,甘心情愿地被分割成一个个信息孤岛,成了真正的

“乌合之众”。这次成功的骗局具备了古今医骗的所有特征:事先造势;制造从众心理;造成患者之间的真实信息隔绝。

北齐时期的一次医骗事件也具有类似的特点,尤其是在造势上,使用了“医托”,唐丘悦《三国典略》记载北齐武安一个妖人与其徒弟团伙行骗,办法是弟子们伪装成盲人及跛足人,号称饮某处泉水,得金佛,其疾并愈。一时间北齐无论贵族、百姓均信以为真。偏巧水中有一只老黄蛤蟆,乍出乍没,人见之莫不以为神奇,就连齐武成帝高湛也率领百官前来饮泉水。骗子们伪装成患者炒作造势,再加上北齐社会风气佞佛,所谓泉水中得金佛就是一次心理诱导,老黄蛤蟆的出现或者是人为,或者是巧合,但不管怎么样,这也是一次重重加码,因为古汉语中蛤蟆就是蟾蜍,自古以来与嫦娥得不死药奔月传说相关,《抱朴子内篇》还把蛤蟆列为长生不老药“五芝”之一,称为“肉芝”:“肉芝者,谓万岁蟾蜍”,既然如此,当然给了北齐民众以极大的鼓舞,从皇帝到民众趋之若鹜。

唐朝的皇帝们没有北齐皇帝那么荒唐,低层次的骗术他们是不会上当的,但是唐朝皇帝有一项家族传统——服丹药,可谓“矢志不渝,前仆后继”,明文记载直接或者间接死于丹药的多达六人,分别是太宗、宪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武宗、宣宗,占唐皇帝总数四分之一。其中有直接被毒死的,如太宗,亦有服丹药后导致精神怪异引发谋杀的,例如宪宗、敬宗。为他们提供丹药的术士,有的是真正相信自己的法术,有的则是不折不扣的骗子。

贞观二十一年,唐特使王玄策借尼泊尔及吐蕃兵征服北天竺,带回天竺方士那罗迺娑婆寐,该人自称 200 岁,会炼长生不老药,太宗此时年纪渐长,与很多君主一样,早年间锐意进取,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,晚年则开始求助于各种神术,以求延年益寿,再加上一直有“风疾”(心脑血管疾病),所以轻信了这个“外来和尚”,服用其药,不久驾崩。朝廷欲治天竺方士之罪,但“恐取笑戎狄而止”。